

长臂管辖：经济“教皇”发动的“隐秘战争”

——读《隐秘战争》

■ 张海冰



《隐秘战争》

[法]阿里·拉伊迪著

法意译

中信出版集团出版

以往人们认为，国际经济竞争虽残酷但基本公平，各国比拼的是资源禀赋、生产效率以及科技能力，但目前国际很多事态的发展，日益明显地揭示出经济竞争背后的非经济因素。

20世纪70年代，日本经济正处于高速起飞阶段，对石油的需求量激增，这时恰逢中东国家为拿回石油资源控制权而爆发石油危机。日本当时执政的田中角荣内阁频频和阿拉伯国家往来，形成了以己为主的“资源外交政策”，让以控制全球石油等战略资源为己任的美国非常不舒服。

时任美国国务卿的基辛格访问日本时，要求田中角荣放弃资源外交政策。田中不买账：美国能给日本需要的石油么？噎得基辛格哑口无言。没想到，几个月后，《文艺春秋》杂志爆出《田中角荣研究——他的财源和人缘》，揭露田中资产形成的疑点和包括男女关系在内的私生活，成为导致田中辞去首相职务的重要一击。

杂志社如何能获得首相的隐私呢？时人猜测是美国提供了足够的证据。其中，东京“地检特搜部”（地方检察院特别搜查部）功不可没。

日本东京地检特搜部的前身是“二战”后成立的隐匿退藏搜

查部，主要负责搜查“二战”中日本掠夺的隐匿物资。此部门由美军主导成立，后逐步演变成美国控制日本政坛的有效工具。日本政治家一旦表现出反美倾向，对美国的利益或政策构成威胁，东京地检特搜部就会行动，以反腐败名义将不听话的政客拿下马。可见，美国对其他国家的影响和控制，长期以来可谓竭尽所能。

有人说，日本是“二战”战败国，不得不接受美国的控制，那么，请看发生在法国的事。

法国在“二战”中曾不战而降成为天下笑柄，但以戴高乐为核心的自由法国坚持抗争赢得了普遍尊敬。作为民族主义情结很强的领导者，戴高乐在战后表现出强烈的反美倾向，一直坚持打造独立自主的法国武装力量。1966年2月，戴高乐甚至决定退出北约军事一体化机构。

“法国如果不伟大，就不成其为法国”，这样一个欧洲核心国家，在戴高乐去世后又被美国逐渐纳入其轨道。本书作者阿里·拉伊迪披露，当特朗普决定美国退出伊朗核协议时，随着美国对伊朗经济制裁的恢复，所有法国公司不得不放弃已在伊朗投下的资本，否则就将暴露在美国财政部海外资产控制办公室的围猎视线范围内，面临支付天价罚款的风险。美国之所以对

外国公司也具有管制能力，是因为其司法部门拥有一套比东京地检特搜部更强大的全球干预武器——长臂管辖体系。

近年来，美国的《反海外腐败法》以及针对违反禁令行为的法律，即《赫尔姆斯-伯顿法》和《达马托法》正逐步扩大其域外适用效率，其目的并非为了维护世界经济秩序和营商行为的合法合规，而是“将美国自身利益和商业道德绑在一起相提并论，甚至混为一谈”。法国政治家指出，美国法律有两个目标：对目标公司的财务进行沉重打击；削弱这些公司的实力，使它们在美国竞争对手

可能进行的收购面前更加脆弱。

法国曾引以为傲的重工业集团——阿尔斯通公司就是因这样的打击而溃不成军，这个惊心动魄又令人悲伤的故事，已在当事人——阿尔斯通锅炉部门全球负责人皮耶鲁齐记述自己与美国司法部的抗争与妥协的著作《美国陷阱》中得以详尽介绍。《隐秘战争》则回顾了西门子、阿尔卡特-朗讯、阿尔斯通、法国巴黎银行、德希尼布公司等欧洲企业遭受美国长臂管辖的命运，深入详细地分析了另一家法国乃至欧洲的明星企业——空中客车所面临的长臂管辖危机，指出这家欧洲飞机制造商实际上是由波音公司发动的经济战争的受害者。

读罢《美国陷阱》，再读《隐秘战争》，可从更高视野、全景式地了解美国长臂管辖体系的历史、现状和欧洲国家逐渐觉醒与之抗争的过程。作者阿里·拉伊迪指出，欧盟大多数成员国并无对抗美国域外立法的打算，有些是主动选择了亲美态度而放弃抵抗，有些是自觉国际经济交往有限而觉得无此必要，而更多的原因恐怕是无力抵抗，即便是德国这样的经济强国也不愿激怒美国。

中世纪的欧洲，有些强势的教皇认为自己既是基督教会

的最高裁判官，从而无视国王而对各国事务发号施令，国王则大多敢怒而不敢言。11世纪初，德皇亨利四世与教皇斗争失利而被开除教籍，国内诸侯乘机反叛。1075年1月，亨利四世冒着风雪严寒前往意大利北部的卡诺莎城堡，向教皇“忏悔罪过”。亨利四世身着罪衣立在城堡门口三昼夜，方获教皇赦免。这就是西方历史著名的“卡诺莎之辱”，又称“卡诺莎晋见”。

阅读《隐秘战争》，似乎看到全球经济领域的一个教皇正向各国发号施令，动辄以某国违背其法律而施以“不许进入美国市场”“不许获得美国产品和技术”“不许进入美国主导的金融结算体系”等制裁。令人颇感失望的是，在美国这个全球经济“教皇”面前，无论是法国还是欧洲其他国家，都呈瘫痪状，敷衍拖延。作者写道：“欧盟指望通过对话来平息美国司法界的怒火，但从不曾试图从根本上解决美国立法的域外管辖权问题。”

可见，国际经济竞争既是资源禀赋、生产效率及科技能力的竞争，更是国家独立自主性和捍卫自身利益能力的竞争。美国的司法域外管辖权同样威胁着中国企业，我们必须予以深入研究，寻找自己的应对方案。

体制宏大考辨精 资料宏富集大成

——评《唐五代文编年史》

■ 刘万川 曹向华

《唐五代文编年史》（简称《编年史》）是一部磨砺了15年的巨著，也是唐代文学研究的重要成果。唐五代文多若星辰，但学界对唐文的研究远落后于诗歌，其原因之一就在于对唐五代文缺乏总体了解与把握，尚未对存世的唐五代文进行清理编排。《编年史》的问世，既是第一部唐五代文的编年史，也必将为唐文的总体研究打下广阔而坚实的基础，为各文体史之研究提供方便。

《编年史》对唐五代所留存的代表性文章、作者主要生平和创作交游以及重要政治事件与文化等活动进行逐月、逐年编排，客观地展示了各体文章撰著及演进发展之原初面貌。细审全书，有三点尤其值得称道。

其一，体制宏大，视野宽阔，亦不乏重要视点的展现。唐五代文中既有文采斐然之作，也包含众多实用性文，如诏敕、制诰、章奏、表疏、墓志、碑铭、书信等。囿于所谓纯文学观念的束缚，学界历来对上述文体的文章较少论列，《编年史》则众体兼录，据其写作年代择要编列，能展现唐五代文创作较完整的原本面目，同时有利于研究者进行横向和纵向的比较分析与研究。

《编年史》将众多作者及其互相交往、创作活动、重要时事和创作背景，以时间

为序，犬牙交错地编制成一幅唐五代文人创作的立体生动画卷。五代十国为乱世，诸国并存，朝代更迭频仍，文士星散各处。《编年史》处理妥当，既有其时文章及其作者时代大视野的编制载录，也有重要的时、地考察记录。如唐哀帝天祐四年九月，《编年史》对当时几位文名较著者行迹的记录：“张贻本年前入蜀依王建，及开国，拜膳部员外郎。王建召张道古为武部郎中。未几，复贬茂州。李珣字德润，梓州人，时已在蜀。贯休已入蜀，先居东禅院，永平二年，王建为修龙华禅院，赐号禅月大师。牛峤在蜀，拜给事中，未几卒。”从而展示了蜀国该年前后的基本文学状态。

其二，收集广博，甄辨考证有力。清人搜集编成的《全唐文》卷次浩繁，漏网之文仍不在少数。《编年史》作者尽可能地编录了所能见到的《全唐文》外的唐五代文，以《全唐文新编》《全唐文补编》《全唐文补遗》《唐代墓志汇编》《唐代墓志汇编续集》《唐大诏令集续编》等为补充，且对于单个作家文章数量的记载也尽可能予以完整统计。如盛唐开元二年，记“贺知章在太常博士任，撰《戴令言墓志》，随即对贺知章著作统计辑补，除《全唐文》存文两篇，又统计《唐代墓志汇编》三篇，《全唐文补遗·第四辑》两篇，《全唐文补编》三篇，共

十篇。

所谓编年，是将所选入的众多作家的文章进行逐年考订，然后以作文时间先后进行有序载录。考订非易事，陈铁民先生在《编年史·序》言：“编年史的撰写，是一件难度很大的工作。难就难在首先得把数百位作家的生平事迹弄清楚，还难在要将各个作家的主要诗文的创作时间搞确切。曾为唐代作家编写过年谱的同志都知道，作这项工作常常‘苦无所本’，即找不到系年的依据，而费力搜罗来的一些材料，还往往互相矛盾，不下一番艰辛的考证功夫，很难得出可靠的结论。”《编年史》进行了细致而审慎的考证。如唐穆宗长庆二年九月之编年，作者据文本分析，从地理文学的角度进行考辨。李德裕应段文昌之请，撰《丞相邹平公新置资福院记》。这一判定是撰者结合《旧唐书·穆宗纪》《旧唐书·段文昌传》《新唐书·段文昌传》《舆地碑记目》《集古录目》等正史及地理、金石碑志资料而断定“丞相邹平公”为段文昌，文章当作于李德裕出任润州刺史前的。

《编年史·前言》中说：“部分文章的系年乃取自学术界的各种研究成果和各种唐人年谱。”可见撰著者视野宽阔，收集广博，论证有据。

其三，资料宏富，为多种文史专题研



《唐五代文编年史》
吴在庆主编 丁放副主编
黄山书社出版

究的深入开展提供线索、资料与方便。

《编年史》以年月为纲、史实为背景，以人物为经、文章为纬，组织勾连，用大量文献资料逐月逐年编织成唐五代360年各体文章的创作宏图，同时包罗了唐五代主要历史政治事件、朝廷所颁政令与各项政策措施、诗文创作和文化活动等。从这一角度说，《编年史》也是别样的多功能文学史著。比如，要研究某种文体的文章在唐五代时期或某阶段的创作与演变状况，即可通过《编年史》逐年检视该文具体代表性的主要文章。又比如，要知道某年或某一历史年代发生的重大历史政治事件，及其对文人行踪、心态和文章创作是否产生影响，同样可通过《编年史》获得相关资料与线索，继续追踪更多资料，深入展开研究。

唐五代文极为繁富，新面世的文章分散各处，有的很难得到，更遑论唐五代文总数正不断更新；加上撰者难免的偶尔取舍不当，所以存世而未编入的重要文章还有相当部分，难免影响到编入著作的完整性，也或多或少地对《编年史》学术水平有所影响。这是《编年史》今后还需不断完善和弥补的缺憾。